

中国官府藏书

Zhongguo Guanfu
Cangshu

肖东发 主编

何东红 朱赛虹 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官府藏书

Zhongguo Guanfu
Cangshu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官府藏书/肖东发主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12

(藏书·中国丛书系列)

ISBN 978-7-221-08410-1

I. 中… II. 肖… III. 藏书—历史—中国—古代 IV.
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777 号

策划人 辛 竹
出品人 杜培斌
责任编辑 杜培斌 孟豫筑

藏书·中国

中国官府藏书

Zhongguo Guanfu Cangshu

肖东发 主编

何东红 朱赛虹 编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91 千字

印 张 16.25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1-08410-1/G·2682

定 价 39.80 元

序

肖东发

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无论官藏、私藏或是宗教藏书、书院藏书均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历史文化。正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涓涓细流的汇入，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各种藏书楼这一绵延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

由于藏书直接关系到读书教育，所以藏书是否发达与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出版业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中心关系相对薄弱，唐以后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显著。汉以降私藏中心逐渐由西向东南转移，逐渐远离政治中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私家藏书事业持续繁荣、风景独好的事实很能说明这一点。就全国范围来统计，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其中尤以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为最，占全国藏书家的74%，仅江浙两省就占到64.9%。科举制度似与私人藏书结下不解之缘——历代产生进士、状元最多的地方也总是私家藏书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共有状元89名，其中浙江20名，江苏16名，江浙两省共36名，占总数的40%强；清代共有状元114名，其中江苏49名，浙江20名，江浙两省共69名，占总数的60.5%。换句话说，明清两代共有203名状元中，江浙两省占有105名，超过半数。天下文状元，二人有其一。据范凤书先生在《中国私家藏书概述》一文中统计，全国著名藏书家共4654人，浙江省有1062人，江苏省967人，两省共2029人，占全国总数的43.6%，足以说明藏书与地域及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明清时期江浙文化的强劲优势显现无遗，江浙私人藏书中心持续繁荣的因果也就有了很有说服力的注解。这些虽是后话，但与唐宋时期私家藏书打下的基础也是分不开的。

从个体角度看，我国古代藏书家绝大多数出身于官宦，在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明清510位藏书家，出身官吏者有286位，占到56.1%。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夫妻等关系的就有87家，

也就是说至少有174位藏书家相互之间有亲属关系，占总数的34.1%，超过了3/1。然而，私家藏书楼的寿限普遍较短，少则十数年，多则数十年，鲜有超过三代百年者。仍以《藏书纪事诗》为据加以统计，藏书三代以上者54家，占10%左右，藏书四代以上者13家，仅占2.5%。天一阁的著名正可证明其是古代藏书楼中极少长寿的风毛麟角。但宏观地看，私家藏书系统的生存机制极强，其分散零藏、彼此散聚、频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强韧性及“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广泛可适性。

有人说中国古代的藏书楼重藏轻用，具有吝惜性，因聚书不易，藏书家具有开明识见者为数不多，也仅有13家，仍占总数的2.5%，尽管秘藏吝借的藏书家历代多有。所谓用，应该理解为有多种方式。将藏书束之高阁，藏而不用的藏书家并非多数。他们大多利用自己的藏书著书立说，或校勘刊刻秘籍以利后人，据对《藏书纪事诗》的统计，古代藏家有著述者208位，占40.8%，校勘刊刻者73位，占14.3%，再加上不吝借的13家，对藏书能加以利用的有294家，占总数的57.6%。这些数字还是该书有明确记载者，实际情况还要超过这个数目。所以，轻易用“重藏轻用”来给各类藏书下结论是不准确的。他们很重视自己藏书的价值而且多方加以利用，只不过使用范围有限罢了。

探讨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历史作用，若抽象泛言之，则可以说其对我国历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无疑起着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国民素养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还应该提及的一点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两大发明即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藏书事业在其中的催化和促进作用实在应予充分的肯定。发明源于需求，正是缘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而大量的迫切需求，正是在以官、私藏书楼为主体的巨大需求市场的刺激下，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才得以萌发并逐渐成熟、广泛应用。历史清楚地显示，唐代及唐以前的书籍市场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处于一种典型的供方市场，直至宋明版刻大盛，才逐步扭转这种状况。历代大大小小的无数藏书家在忙碌于收书、藏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伟大发明的催生婆——一个光荣的角色，一份集体的荣誉。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会是不同的结果，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不难发现，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生产与捐公上。

贡献之一，典籍的保存。这在秦汉时期即已有显著表现，秦始

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毁损,如此高压血腥之下仍有许多的藏书家敢冒杀头危险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征集的对象主要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也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说藏书家的贡献巍如丘山,实不过分。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如接力赛一般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递传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毁损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巨。以单一藏书楼论,宁波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四百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战乱烽火奋不顾身抢救出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业绩,更是突现了藏书家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古代藏书事业的各个系统之间有着必然的或多或少的关联与相互影响,尤其以私家藏书对官府、书院、寺院等系统藏书贡献最为突出。在藏书来源方面,官藏与私藏各自从对方获得补充和支持。汉代以后历代政府向民间屡次征书即是官府藏书获取私藏支持的例证。历代战乱或政权更迭后大伤元气的皇家藏书体系多赖民间众多藏书家聚沙成塔般的支持而得以重振声势,后来居上。而私家藏书也曾通过获得朝廷赐书或借抄皇家秘阁藏书等途径不断地丰富内容,扩大规模。双向交流还是以前一种为主。

贡献之二,典籍的流播。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家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的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以传布为己任,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记载:“崔氏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多来从假借……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宋代宋敏求藏书三万多卷,以慷慨借书于他人闻名一时。周永年撰《儒藏记》,倡导藏书的开放流通,并与他人一起创建“借书园”,专门供人阅读。长沙的顾陞升则认为如果藏书不能为他人阅读,则是徒藏书之虚名,所以几乎天天门庭若市,借书者天天都有。宋咸熙有《借书诗序》说:“藏书家每得秘册,不轻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鼠伤虫蚀,往往残缺,无怪古本之日就湮没也。先君子

藏书甚丰，生时借抄不吝。熙遵先志，愿借与人，有博雅好古者，竟持赠之，作此以示同志。”这一做法扩大了典籍的受众面与利用率，也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藏书家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十分值得肯定。

二是借抄之途。从借出方看，藏有者不以珍稀为秘，无私提供底本，使一书由此而复制出更多的副本。在古代通讯、交通俱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许多人的辗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还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四处传播。从借抄方看，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借抄过书，许多人借抄的书数以千计。他们或抄自馆藏，或源从私家，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千方百计，孜孜以求，借抄的目的或许仅为丰富和增加自己的藏书，但成百上千的藏书家经年累月的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该有何等大！无数双抄书的手汇合犹如开动了一架永不停歇的印刷机，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来。这种“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效应极大地丰富了民间私藏，增加了我国典籍抗灾祸能力，以致当许多书的刻本毁灭绝迹时，惟赖抄本书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明代汲古阁影宋本及其它藏书楼的不少影宋本保留了许多已失传宋刻本的面貌也是很好的证明。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于是，藏书家便拥有了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后蜀的毋昭裔由藏书而刻书，开了一个漂亮的先例，此后，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刻印者，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他们各自利用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我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有一些藏书家受自身条件限制，有刻书之心而无刻书之力，他们能做的便是奔走呼号，竭力倡言有力者刊行传布。清代的黄俞邵、周雪客是为典型代表，他们为使珍籍得到广泛流通，不致因意外灾祸而一朝湮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全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任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且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响应甚众，纳兰性德刻《通

志堂经解》取其二十二种经书刊行，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九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

贡献之三，典籍的完美。仁人爱物，珍惜字纸可以说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

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对图书的宝爱、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归结起来，历代藏书家对图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的训诫便已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也在于其爱护书的万分用心，如几案必洁净，翻阅务轻柔，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渍、揉伤纸张。元代的赵孟頫更总结了读书护书“八勿四随”的真经，即“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藏书家如明之邵宝、姚咨，清之汪宪、杨继振等均将《颜氏家训》或赵孟頫的上述诫语刻成藏书章钤于自家的藏书，也表露了他们心同前贤、珍惜典籍的心情。更有许多的藏书家以“性命轻至宝重”、“后人观之宜加珍护”、“愿流传勿污损”、“勿恣意涂窜”、“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等印文警示同仁后世务必宝惜典籍。至于像毛晋祈祷“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黄丕烈年年祭书祈求天助神佑，张蓉镜在宋版书上用鲜血书“佛”、“南无阿弥陀佛”、“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江标刻长恩像藏书印乞求神灵护佑，孙从添置春官画于书柜内以驱蠹虫等做法，虽不无迷信、愚昧之处，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些藏书家护书惜书如痴如狂的极致心态。对不可知的天灾人祸虫害的畏惧与无奈迫使他们于深深的爱恋与惶恐交织中出此下策，企求以万分的虔诚感动苍天神灵护佑自家藏书平安。

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能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袭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它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清人方功惠藏书必以东丹笺作副叶，因其可以避蠹。孙从添《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驱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陆烜修补古书别有心得，其《梅谷随笔》中介绍：“修补古书，浆粘中

必入白芨，则岁久不脱”。黄丕烈颇为独创的书籍“复背护持法”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致因频繁取阅而损毁。

藏书家并普遍重视对藏书装潢，把这看作是保护珍籍善本的一种有效措施。许多时候，书籍的装潢费往往超过买书价，藏书家在这点上惊人的豁达慷慨换得的是典籍的美备与新生。如宋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一书，黄丕烈购得时破烂特甚，蠹鱼数以百计，缺叶及无字处每册俱有，黄遂择良工精加装潢，费时近两年始补装一新，其工费已倍于买书价而达百余两银。而黄丕烈为元刻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一书支付的裱托装潢费更高达购书价的数十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的古籍假如没有藏书家及时、精心地妥加整补装潢，或许早在数百年前便绝灭人间了。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工作。可以说藏书校勘是藏书家普遍也是最艰巨最乏味的日常性工作之一，却偏偏有那么多的藏书家乐此不疲，老死无悔，这便是精神的力量所在。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的藏书家默默无闻地屹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衣的苦差。历代藏书家辛勤校勘古籍、补阙订讹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仅在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成果显著者便有顾广圻、何焯、钱大昕、黄丕烈、吴槎客等不少人。如顾广圻，这位清代校书第一大家，一生中校书无数，黄丕烈、孙星衍等诸多名家的藏书特别是刊刻之书多委其精校，以确保所刻书之高品质。夏宝晋在其《墓志铭》中称其“讎校最精，为当世所贵。……补亡纠缪，顿还旧观，有功于古人甚钜。”是为确评。如吴槎客，同时代的黄丕烈赞其“藏书甚富，考核尤精”，常与同好切磋探析古籍中的疑误。如黄廷鉴，自述“余三十年来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种”，为的是“从讹谬中力开真面”，恢复古书本来面貌。五六十种书的校勘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为一种古籍的校勘，许多的藏书家往往需埋首故纸、昏天黑地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校讎，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无独有偶，清人周叔平校《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也用了七八年时间，同样的备尝艰辛。其好

友王春敷述其校书缘由称：周叔平“于此书尤珍惜之，而恨其鱼鲁帝虎，前后错杂，几不可句读。因博访藏书家有是书者，不憚委曲借校，如也是园藏本、东皋柏先生藏本、及浦氏、仲氏诸家本，互有是非，从其是，剔其非，前后积七八年订讹补阙之功，始得文从字顺，可谓勒矣。”（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二）他如黄丕烈之校《国语》、严可均之校《商子》等，俱是数年艰辛，一朝美备。精校出善本，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对历史留传因种种原因导致残缺不全的图书，许多的藏书家总是呕尽心血、刻意觅访，冀期以自己的诚意与努力使尽可能多的残书在自己手里破镜重圆、完美再现。陆俨山、黄丕烈的言论可以说是藏书家普遍心声的代表，明人陆俨山称其之藏书即使残书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黄丕烈在解释自己何以重视收购破烂不全之书时说：“不全者或待残缺之补也。”“如遇不全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曰‘抱守老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一、卷六）天降大任，藏书家众心一致地将拾残补阙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明代的赵琦美购得李诚《营造法式》残帙一部，中缺十余卷，为补全此书，其从此心存块垒，寝食不宁，仆仆遍访于藏书名家、书肆、秘阁，艰辛曲折历时二十余年，终使该书幸得延津之合，臻于完美。徐勃旧藏《辍耕录》一书，缺第一册，其苦觅之十数载无以补全，最后在友人高景倩帮助下，于所购杂书中找到该书半部残本，配成完书。又，其家藏《艺文类聚》缺四册，“每有查考辄恨其摧残非完书也。”也是经本人不懈搜访，数年间或搜购自书摊，或受赠于友朋，终以三残本凑成一完书。徐氏藏书中经其拾残合全的书尚有《华阳国志》、《何氏语林》等不少。

在清代，钱谦益藏宋版《后汉书》缺两册，郁礼藏厉鹗《辽史拾遗》手稿少五十叶，两书最终得以分别复原也多赖书主留意遍访，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残余，传下了合浦珠还的书界佳话。法式善从老妪补窗破纸中捡得明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录三十九叶残余，虽未能补全，但其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赞赏。

贡献之四，典籍的生产。即指利用藏书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汇编等形式创造编著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新的财富，提供更多积累。在这一点上官私藏书楼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书讲，历代诸多类书如唐之《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

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长编巨制无一不是直接利用藏书的产物。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搜访、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献汇编如《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等，均是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著述方面，如叶梦得、郑樵、赵孟頫、王世贞、归有光、胡应麟、胡震亨、谈迁、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杭世骏、全祖望、万斯同等大家名篇迭出、著述等身，俱系利用藏书的巨大支持而各铸辉煌，名重文坛学界。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这一划时代的鸿编，更是官、私藏书楼各逞所长、珠联璧合、共襄其成的范例。

贡献之五，典籍的捐公。进入现代，众多的私人藏书家爱国为公、服务民众的意识更加强烈而自觉，他们纷纷以私藏捐奉国有，难以数计的私家藏书遂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各级各地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国有图书收藏机构，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些捐献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现代藏书家实在有太多太多，他们的光荣代表中有——

梁鼎芬，1919年卒后由其子捐献藏书600余箱给广东省立图书馆。

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藏书捐献北京图书馆。

周叔弢，解放后先后五次共向国家捐献藏书九万六千余册。

潘世兹，1951年将其父宝礼堂全部宋版珍本从香港运回，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此外，如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等。

在浙江，留存现代的著名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冯氏伏跽室、朱氏别宥斋、余氏寒柯堂、李氏萱荫楼、王氏冶庄楼、张氏铁如意馆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在建国后踊跃将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书楼捐献国家，浙江图书馆丰富而具特色的古籍藏书中，私家藏书的捐赠构成了主要的基础。

清末，陆树藩将陌宋楼珍藏顷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令国人疾首扼腕，痛惜不已。这一世纪悲剧从反面警醒、激发了无数藏书

家的爱国、爱民族的情感，随后不久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便是鲜明的参照。对许多以各种方式将藏书售予各类国有图书馆的藏书家，人们同样抱有敬意与感激。

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使命因现代图书馆的崛起而结束，私家藏书楼的生命却因融入了现代图书馆而永续延绵、生机无限。私家藏书的作用与贡献也因此无有穷尽。用这么些篇幅来例证、表彰历代藏书家对中华典籍保存、护惜、流传之功德，并不意味一好百好，对其历史的局限、人格的弱点视而不见或涂脂粉饰，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全面地、历史地、恰如其分地评价藏书家的作用，才必须理直气壮，实话实说。先前对于藏书家的历史贡献的表述太过简略、空泛，而对于藏书家的一些缺失则似过多显夸、过多指责、过多苛求。藏书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秘惜吝借等缺失相对于他们的历史贡献而言，只是大河中的支流，森林中的灌木。

古代藏书楼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人文精神也是值得认真研究充分肯定的。正如后人所说：如果没有这么一支数量大、文化素质高、事业心强、态度严谨的藏书家刻书家队伍，没有他们所建树的一切，流传下来的古籍肯定没有这么多，古书的质量也不会这么精，古籍的作用肯定不如现在这么大，校勘学、版本学、考据学、目录学以及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水平，肯定达不到现在这样的高度。我们应当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支庞大的藏书家刻书家队伍而感到自豪！

北京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何东红，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朱赛虹，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大军、喻爽爽、李云，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系博士生导师徐建华，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林，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副主编赵连稳编审分别主持编撰了《中国官府藏书》、《中国私家藏书》、《中国宗教藏书》和《中国书院藏书》，在讨论框架、提供图片、最后统改文字等方面我做了一点点工作。丛书各卷参考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因为篇幅所限，各卷之后只列了参考书目，没有把论文全部列出，敬请各位方家原谅。在此我对所引用、参考的所有学者的学术成果表示衷心感谢！

还要感谢现代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编审，贵州人民出版社杜培斌副社长，贵州人民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颜小鹏主任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张忠兰、孟豫筑责编，他们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本书在一年时间得以完成。有错漏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序

「目录」



第一章 发轫之初的商周官府藏书

第一节 商王室藏书 1

第二节 周王室藏书 7

第三节 诸侯藏书 13

第二章 成型定制的秦汉官府藏书

第一节 秦代官府藏书 17

第二节 汉代官府藏书 20

第三章 承前启后的魏晋南北朝官府藏书

第一节 三国时期官府藏书 31

第二节 晋代官府藏书 36

第三节 南北朝官府藏书 43

第四章 飞速发展的隋唐五代官府藏书

第一节 隋朝官府藏书 61

第二节 唐代官府藏书 67

第三节 五代十国官府藏书 87

第五章 灿烂夺目的宋辽金夏元官府藏书

第一节 宋代官府藏书 91

第二节 辽金西夏官府藏书 120

第三节 元代官府藏书 123

第六章 繁荣昌盛的明代官府藏书

第一节 明代官府藏书概观 133

第二节 主要官藏机构兴衰沿革 137

第七章 盛极转衰的清代官府藏书

第一节 清代官府藏书综览 149

第二节 主要藏书处所盛衰实录 153

第八章 转型变制的近代政府藏书

第一节 早期建立的公共图书馆 240

第二节 早期成立的公立学校图书馆 243

参考书目

目 录



「第一章」

发轫之初的商周官府藏书

第一节 商王室藏书

殷商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生产力提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逐渐分离，出现了专门掌管记事图书和档案的史官。夏代萌芽的藏书到商逐渐成型，形成我国早期的政府藏书。据《尚书·多士》、《国语·楚语》、《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商王朝自成汤开国始就有典有册，仅《史记·殷本纪》载商王室所著书就有20余篇。学术界普遍认为《尚书》中的《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可信为商代著作。

商代藏书最有力的实证是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甲骨。数以千计的形体规范的甲骨文字和数以万计的记录殷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的甲骨文献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典籍史料。故以甲骨实物为例，可以分析早期官府藏书的具体构成，展现我国藏书史光辉的首页。

藏书处所

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发掘出的宗庙式宫殿遗址，分为地上和地下两种。地上是宗庙宫室，现只能看见版筑的基址和柱础；地下是復穴，窆窖。復穴是地下室，可以居住和工作。窆窖是室内的井，可存储物品。甲骨文献大部分出土于穴窖之中，数量大且集中，称之为“龟室”。以1936年发掘的殷墟127号坑为例，该坑为圆形，坑上口距地为1.7米，坑底距地面6米，从坑口以下0.5米到2.1米约1.6米的厚度，储存甲骨17000多片，显然是殷人的档案库。1973年在小屯南地和1990年在小屯北地的甲骨都是成坑集中发现，因此可以认定甲骨有固定的收藏处所，且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收藏。这些坑穴基本都在王室宗庙宫室处，属宗庙的一部分。可以确定，这些档案是为王室服务的。甲骨文的内容，以卜辞为主，有“大甲宗卜”、“其告于大乙在父丁宗卜”、“大庚宗卜”、“祖乙宗卜”等记载。



商代甲骨窖藏

这些卜辞中的“宗”，即宗庙。大甲、父丁、大庚、祖乙为商王庙号，“大甲宗卜”即在大甲宗庙占卜。可见商王室在宗庙占卜之后，所刻卜辞也藏在宗庙的“龟室”之中。甲骨文也有少量为记事，具有王朝档案性质。

综上所述，商代的宗庙不仅是重要的行政场所和供奉先祖的庙宇，也是贮藏典籍的处所。藏于宗庙宫殿里的典籍是中央政府藏书之始。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可知，近期使用的典籍藏于宗庙之内，典籍多了，宗庙内专门存放的窖穴容纳不下，就将早期的典籍转藏于宗庙之外，但还在宫城区内，也是专门修建的窖穴，有如今日图书馆划分为一二线的辅助书库与基藏书库。

掌书史官

我国早期的图书档案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在甲骨文、金文和早期典籍中“史”字的出现频率相当高。作为职官，有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史、太史、内史、贞人、卿史、作册，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究竟“史”为何意？作为职官，其职责包括哪些方面呢？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史”是象形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何物，则有不同的解释。清江永说是官府书籍；吴大澂说是简策；王国淮说是盛筴之器。现代马叙伦说是笔；劳干说是弓钻，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说：史职专以藏书。“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活动。这一解释亦可在先秦典籍中找到旁证。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之一《尚书》中多处记载了“史”和“太史”的活动，《礼记》、《左传》、《国语》、《周礼》等史书中也言史官职掌有秉笔、执简、掌书、守典、奉法、决狱、册祝等。可见史官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也是掌管图书档案之专职人员。他们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从事宗教祭祀占卜活动，还要兼管奉法决狱事务，甚至要到民间去采风，收集诗歌和音乐，进行整理加工。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资料，修史编书的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他们既是最早的文献资料的制作者，也是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加工者和收藏者，一身而数任。制作、整理、加工、典藏，虽有程序上的先后之分，但对于史官来讲几乎是同步而行，随贞随卜随记随整随编随藏还包括随验随用，不像后世分工明确，这也是典籍收藏起源时期的特点。